

开辟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新境界

张炯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艺在文学、戏剧、影视等各领域取得巨大成就,这既与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分不开,与全国文艺界作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批评家的努力分不开,也与持续推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分不开。人类一切实践都是历史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真理性与它的丰富发展,就在于始终重视不同时代的文艺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正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在重视历史经验和发扬优秀中外文艺传统的同时,不断研究和总结我国出现的新的文艺实践,并把它升华为新的理论观点。40年来,我国文论界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做出不懈努力。

正本清源,以促进文艺繁荣为旨归

新时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首先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及以往左倾文艺思潮的批判,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旗帜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主张“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鼓励文艺内容与形式不断开拓,强调党要按照艺术规律领导文艺,重视文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重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重视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指出文艺领域既要反“左”也要反右,开展反对错误思想的斗争。为了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我国出版界重新根据德文本先后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中国作家协会和北京大学也重新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等书,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和毛泽东文艺思想、邓小平文艺理论的论著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辞典》和马克思主义文论教材也相继推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文艺应该“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认为这是继承“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他倡导文艺讴歌英雄的时代,反映波澜壮阔的现实,要在作品中贯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崇高精神,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之后,胡锦涛同志重申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指出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存在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中。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激励下,我国文论界先后就文艺与政治、形象思维与艺术特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对我国出现的新的文艺实践的研究总结和理论升华。40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取得丰硕成果,立足中国现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既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在融会贯通中实现理论创新,有力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性、现实主义与现当代主义、主体性与客体性、女性主义和新人文精神、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等问题展开过热烈讨论,对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探索性戏剧、现代派绘画和行为艺术等也展开不同见解的批评交流。这些都有益于明辨是非,有益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越辩越明,从而发挥指导作用,有力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

兼收并蓄,在融会贯通中实现理论创新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取得过灿烂文艺成就,历代文论家在总结文艺实践经验、探索文艺规律方面也撰写过众多著作,提出过许多精到见解。如揭示文艺发展规律方面的“文贵创新”“质文代变”,揭示文艺本质方面的“意象”“意境”等主客体相统一的概念等,都极具真知灼见。传统文艺理论作为我国现当代文论发展的必然源头和不竭动力,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必不可少的理论资源。

改革开放迎来中外文化包括中外文艺理论交流与撞击,特别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文艺思潮及其作品的引进,激发我们对相关文论问题的思考。这种背景下,对西方现代文论的批判、借鉴和吸收,也是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重要参照。40年间,我国文论界编辑出版了大批阐释我国传统文论的著作,也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文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著作,还撰写了大批梳理和研究中外文论和美学理论的史著。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的《中国文学通史》、李希凡主编的《中华艺术通史》、王运熙和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敏泽著《中国美学思想史》、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思想史》以及胡经之著《中国古典文艺学》、饶芃子著《中西比较文艺学》、温儒敏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冯宪光著《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等。这时期出版的钱中文、童庆炳、陆贵山、董学文等众多理论家的文艺学新著,包括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项目中的《文学理论》一书,都努力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批判吸纳我国传统文论和西方现代文论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

无论是吸收传统文化的有益养分,还是借鉴西方文化的他山之石,都是在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相互启发、相互借鉴、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中发展理论。但吸收不是全盘复古、食古不化,借鉴不是生搬硬套、强行阐释,真正重要的是放在我们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加以考察,有选择地拿来为我所用,而且要以现实实践作为理论升华的依据,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

文学期刊,勿忘策展

颜妍

发于《十月》,无怪乎有人将其四十载称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部缩影”。这并不是《十月》独享的殊荣。不久前,由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等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40部最有影响力小说”发布,《尘埃落定》《古船》《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榜上有名,而在这些耳熟能详的名篇佳作背后矗立着的是一众文学期刊的身影。活动方找出相关作品的原发刊物,磨损的封面、发黄的纸页、素朴的装帧,正是这一本本带着年代印记的文学期刊,以及一次次翻看阅读,托举出中国当代文学深入人心的新经典。

诚如研究者所言,当代文学期刊在某种意义上是当代文学史的草稿。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忽略文学期刊对文学的影响和塑造,而关注文学期刊,又不能忽略它在这40年里经历的起伏与蜕变。今天已经很难想象,《当代》的发行量曾一度高达60万份,那是文化生活匮乏、文学被众星捧月般高高举起时代的产物,也是文学期刊的高光时刻。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日益繁荣,文化选择空前多样,文学不再处于焦点地位,文学期刊的危机感也与日俱增。于是才有上世纪90年代风起云涌的文学期刊改版潮:或者打破传统的“四菜一

汤”,在栏目设置上出新出奇,或者扩大文学外延,走“大文学”路线,再或是靠鲜明的文学主张、创作口号来引领潮流风骚……此番市场淬炼带来文学期刊界的更新换代。新世纪以来,依托互联网发展的强势新媒体给文学期刊带来比上一轮市场化更大的冲击。文学现场吞吐量惊人,网络文学异峰突起,文学边界被不断挑战,越来越多的作品越期刊,直接在网上传播,或者以单行本形式做更有针对性的市场营销,给“发掘”文学带来难度;新人层出不穷,各立品牌,在传播力、曝光度和阅读率上,文学期刊并无优势,给“凝聚”作家带来难度;经由上世纪80年代培育起来的传统文学读者群日益老龄化而渐渐流失,年轻一代读者受教育层次、审美追求和阅读习惯大为不同,尚未与期刊建立有效链接,给期刊“抵达”读者带来难度。与此同时,不能否认的是,文学APP、文学电子杂志、文学主题微信公众号层出不穷,业余写作群体与日俱增——人们显然依旧需要文学,文学也并没有离场。在这个背景下,《十月》把一场名为“设计文学——以期刊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生产”的国际文学期刊论坛作为40周年纪念尾声活动,就显得意味深长。所

在基层写戏几十年的一个深刻体会是:只有写感动自己的题材,才能感动观众,只有写出思想境界、发时代新声,才能受到观众喜爱



发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

郑怀兴

我从事戏曲编创工作快40年了。从第一部戏至今,历史剧创作一直是我的偏好。为什么热衷历史题材呢?现在想来,不仅因为我的成名作是历史剧,更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历史。上世纪60年代读高中的时候,《历史研究》是我必读的刊物。我的家乡是福建省仙游县,那里流传着古老剧种莆仙戏,我从小就喜欢看,并从传统戏曲中懂得很多人生道理。大专毕业,我刚被分配到县编创小组时,偶然听到一位前辈讲东晋王敦之乱的故事。这个故事引发我浓厚兴趣,于是我为此写剧本写成《新亭泪》,想不到后来获得全国第一届优秀剧本创作奖。从那之后,创作历史剧成为我的主攻方向,迄今为止已经写了22部历史剧。我始终怀抱这样一个宗旨:无论是自选题材还是应邀而写,从不勉强写就,故事必须能引起我强烈兴趣,让我产生创作激情,才会欣然命笔。这也是我在基层写戏几十年中的深刻体会:一定要写感动自己的题材,要是自己都感动不了,怎么能感动观众、吸引观众?

我一直留心明代倭乱问题,因为戚家军抗击倭寇最大战役是在我的家乡仙游打的。我现在的居住地更是当年发生鏖战的古战场,“十八战”“九战尾”“五百洗”“无头岭”这几个地名,至今听起来还令人惊心动魄;“初二探三日”“白额春豚”“初五补做火岁”等发生于倭乱时期的特殊现象,也早已演变成仙游人的风俗习惯。因此,当我在几年前偶然发现明代嘉靖年间宁波有位生员曾乘槎浮海招安倭寇首领王直的故事时,立刻引发思考——倘若当年招安成功,祸害东南沿海多年的倭患岂不平息了吗?明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莆田、仙游百姓正沉浸在准备春节的欢乐时刻,倭寇突然侵袭,两个城池都被攻陷,数万百姓被杀害,房屋被毁无数,尸横遍野,万家哀恸……于是我产生写戏冲动,很快写出《浮海孤臣》。

回顾历史剧创作历程,另一大感受是作品只有写出思想境界、发时代新声,才能受到大众喜爱。我写《傅山进京》,不是颂扬他反清复明,而是凸显他对自立自强人格的呼吁。我写《于成龙》,不是简单讴歌一个廉吏,而是写他被革职之后,依然具有士大夫担当精神,勇于接受巡抚委托去东山处理民变。理性地看,于成龙的功绩是对百姓最有利的举动!这样,我写的晋剧《于成龙》就不落俗套,有了鲜明个性。

写历史剧还要善于艺术虚构。三年前,秦腔名旦齐爱云邀请我以清末泾阳安吴堡女商人周莹为原型写戏。史料记载周莹给慈禧捐赈50万两银子之后,二人有过彻夜长谈,我感兴趣的是周莹究竟为什么要捐赈巨资?彻夜长谈究竟谈了些什么?能不能在此基础上大胆地进行艺术虚构?我仔细搜寻史料,发现同一时间的另一历史人物——作为陕西维新派领袖的关学大儒刘光贲,当时与康有为并称“南康北刘”,“戊戌变法”失败后,刘光贲被当作“康党”革去山长之职,慈禧在西逃时会不会命令抓捕刘光贲,以保障自己安全?周莹会不会为营救刘光贲而设法觐见慈禧?夜谈有没有可能围绕这个事件展开?这个猜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史实作依据。周莹曾助刘光贲办学印书,她的先进经营理念明显得益于关学和刘光贲的维新思想。想到这儿,我喜出望外,才思泉涌,很快就写出秦腔历史剧《关中明月》,塑造了以周莹为原型的戏曲艺术形象商英。

创作历史剧与编写历史教科书不同,写戏离不开史家提供的史实,但更要在史料基础上发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史家重在“事”,编剧重在“人”;史家重在“史”,编剧重在“戏”;史家重在“实”,编剧重在“心”;史家重在“理”,编剧重在“情”;史家重在“直”,编剧重在“曲”。用傅山的话来说,编剧要“曲尽人情,愈曲愈折;戏推物理,越戏越真”,情节越曲折,人物形象越鲜明,戏才越好看,“即此半假半真局面,却是大开大合文章”。

郑怀兴,生于1948年,福建仙游人,国家一级编剧。代表作有历史剧《新亭泪》《林则徐》《傅山进京》《关中明月》《浮海孤臣》《嵇康托孤》、现代戏《遗珠记》《鸭子丑小传》等,出版《戏曲编创理论与实践》《郑怀兴戏剧论集》。首批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获全国优秀剧本创作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大奖、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等。

